



# 跟隨毛主席長征

GĒN SUÍ MÀO ZHŪ XÍ CHÁNG ZHĒNG

陈昌奉著

# 跟随毛主席长征

陈昌奉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**跟随毛主席长征**

陈昌奉著  
董辰生插图

\*  
**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**  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**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**

\*  
**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37,000**

**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版**  
**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**  
**印数 1—350,000**

**统一书号：10372·443**  
**定 价：0.23 元**

## 目 录

一	最初的日子 .....	1
二	关于“家” .....	9
三	踏上长征第一步 .....	16
四	过苗族区 .....	22
五	乌江边上的新年 .....	30
六	彝族人民欢迎毛主席 .....	35
七	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.....	41
八	向水草地前进的路上 .....	48
九	雪山草地间 .....	51
十	六盘山上 .....	64
十一	我们到了家了！ .....	68
十二	主席送我入学 .....	76
十三	辞别主席到前线去 .....	83

## 一 最初的日子

一九一五年秋，我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名叫岭脑村的庄子里。家里很穷，十一岁死去母亲，父亲靠给地主扛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因为贫穷，又遭受地主土豪的迫害，所以，我从懂事起，就从心眼里痛恨那些吃人的剥削阶级。

一九二八年，在我们那一带村子里，忽然飞传着一个消息：有一支红色的队伍，穿过宁都直往瑞金、大柏地挺进。这一新鲜传说，波动了全村所有的人。穷人们听了就高兴，他们说，那是打地主土豪搭救穷人的队伍，名叫“共产党”、“红军”。富人们听了就害怕。我那时虽然还不懂事，可立刻就相信了穷人们的说法。

又过了不多日子，村中一些跑外的小贩，从福建长汀一带回来，他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新鲜见闻。他们说，长汀被红军拿到手了，他们在那斗地主，打土豪，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田，伸直了腰杆，扬眉吐气了。我一听心里可乐了，成天价盼望着这批穷人的队伍有一天会到自己的村里来。

这一年新年，我家因欠土豪的钱被抄了。家里的东西，从野外的一小块土地到屋里盖的破被子，都被抢走。幸亏邻居们说情，才留下一口做饭的破铁锅。日子更艰难了，从此我就给人家放牛。那时的日子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，牛马干完了活儿还能吃上草料，可我们一家子连一碗稀饭也喝不上。怎么办呢？找红军去！农历正月初二的那天黑夜，我和同村一个青年，背着家人偷偷地离开了故乡，直奔福建长汀，毅然决然地找红军去了。

我们走到了离长汀还有十五里的一个山岗上，一眼看到两个头戴红星帽徽的军人在那里站岗，“这一定是红军！”我和同伴立刻跑上前去，问明了之后就高声说：“我们是来当红军的！”那两个同志详细地盘问了我们之后，就指着长汀说：“那里有‘扩红队’（即扩大红军宣传队）。”要我们到那里去报名。

到了长汀，在一座大石桥上，果然碰见了“扩红队”，可把我们高兴死了，不容分说就要参加，可没有想到他们端详了我半天，摇摇头，说我年龄太小，扛不动枪，不能收留。为了这一点，我还哭过呢！我大声地说：“我非当红军不

可，不让我参加我就不走！”他们看我那么坚决，终于答应下来，从此，我就当上了光荣的红军。

参军后，我被分配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当号兵。

一九三〇年三月底，我们军部驻在江西永丰县白沙村。一天中午，首长把我叫去，说要调动我的工作。我问他：“调动什么工作呀？”

“调你到前委去，给毛委员当勤务员。”首长说完，满面笑容地望着我。

“前委”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简称。这我知道。可这位毛委员是谁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不用说，他是个首长，不然怎么能够有勤务员呢？可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的脾气好不好呢？

到了“前委”，一位个子挺高的同志领我去见主席。我心里很紧张。一边走一边想：这毛委员什么样？……想着想着就到了主席的房子。主席住的是江西那种小楼式的木房子，一共两间，一间是宿舍，一间是办公室。我们从宿舍门进去，一打眼就看见一张普普通通的木板床，上面铺着一条布被单，连个枕头也没有。走进办公室，见主席和一个人正在谈话。领我来的那位同志指着

主席说：“那就是毛委员。”

我向前走了一步，好奇地望着主席：他穿了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，正在用手比划着和对面一个人谈着什么。声音挺柔和。不一会儿，对面那个人站起来，主席也站了起来。我这才发现主席的个子很高大。

等那人走出去之后，领我来的同志把我引到他面前说：“毛委员，给您调来了个勤务员。”他转身指了指我。

我赶忙上前打了一个敬礼说：“报告！”

主席望着我笑了笑——他笑得是那样慈祥、温和。这一笑把我原有的拘束一扫而光了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主席问。

“姓陈！”我大声回答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昌奉！”

“陈昌奉！”主席慢慢地问：“十几啦？”

“十六岁！”这时我回答的声音自然一些了。

“为什么当红军呀？”主席象老师问小学生似地问我。

“红军好，打土豪！”我还是立正站着。

主席指着一把椅子，示意让我坐下，很有兴致地问我：“你们家乡有土豪吗？”

“有！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。”我就把我的家庭情况和怎么参加红军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主席很注意听我讲，不时地点点头并微微发笑。

“很好！”主席对我说：“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。”他停了一下又问：“你能写下自己的名字吗？”

我站起来，望着主席，小声地说：“我没念过书，不会写字。”

主席笑着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说：“以后要学会写，要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也会写许多人的名字。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我低声回答。

主席转过身去，对那位带我来的同志说：“这是新同志，你们要好好地帮助他！”随后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问他们。”

我跟着领我来的同志刚走下楼来，他就拉着我说：“毛委员很忙。你要记住，在他看文件的时候，可不要吵，不要弄得满处乱响。还有，他

每天晚上总要工作到深夜，第二天的早饭要晚一点打。懂吗？”

“懂了！”我高兴极了。当天晚上兴奋得一宿没睡好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同屋的同志都问我夜里作了什么好梦，又说又笑。我朝他们做了个鬼脸，提起小木桶打洗脸水去了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还是昨天带我见主席的那位同志问我。

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给毛委员打洗脸水呀！”

“你看！”他显出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不是告诉你了嘛！毛委员睡得晚，不要吵醒他嘛！”

我放下木桶，知错地笑了。后来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早上打了水，轻轻地提到楼上，我就坐在小楼门口的一个小吊椅上，静静地等着主席的吩咐。可主席却很少叫我。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。

有一天，主席洗了脸就问我：“陈昌奉，你怎么老坐在那里不动呀？”

我扶着摇晃的小吊椅说：“怕您有事，找不到我。”

主席笑了笑，象对孩子似地说：“以后不要光坐在那里了，有空就去和大家一块学习。我没

有更多的事要你做。”

那时差不多天天打仗，到处流动，在一个地方顶多住个把月。主席的生活很俭朴，很快我就摸熟了他的生活习惯。那时主席的全部行装是：两床毯子，一条布被单，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，一件银灰色的毛衣。用的东西是：一把破雨伞，一个吃饭用的缸子，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。主席用的地图、文件、书籍等，全部装在这个挂包里。每当行军作战，主席背着挂包拿着雨伞，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。到了宿营地，找两块木板对起来，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，用衣服打成枕头，这便是主席的卧铺。

主席晚上睡觉很少，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，打开挂包，拿出文件、地图、书籍和纸、笔就开始工作，有时一直到天亮。

我那时年龄小，不能熬夜，主席看书、写字，我就在旁边坐着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，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。每当主席推醒我时，我们俩就都笑了。于是主席就叫我去休息。

夏天，常常在半夜时分，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，说：“搞点水来吧！”我这才醒来，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。因为没有脸盆，

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，有时擦擦澡，提提精神。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，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“三层饭”——最底下一层是米饭，中间是一点菜，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——去热一热给他吃。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，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，留着下顿再吃。一次，我把他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。第二天主席便问：“陈昌奉，昨天剩下来的饭呢？”我照实说了，他批评我说：“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，下次剩的不准倒掉，留着下一顿再吃。”

那时整天行军作战，主席有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总想给他搞一个暖水瓶。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地方，得到了战利品，主席不是把送给他的东西给战士同志，便是送到医院里去给负伤的同志，自己从来不要。一九三一年冬天，我们打开了江西吉安，我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了个搪瓷暖水瓶，心里很高兴，有了这个暖水瓶，喝水不成问题了，可吃饭还是不方便。那个小缸子盛夜餐还可以，一行起军来就不行了。有时候打一仗我们就走，走到中途大家都休息吃饭了，主席却还是用那个缸子吃“三层饭”。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。他当选了共和国主席，从那时候起我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委员改成毛主席。

## 二 关于“家”

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，主席时常派人或亲自领着我们先去敌人的县（镇）政府，找敌人的档案文件，再去当地的邮局，买报纸和杂志。往往我们空着手跟他出去，转一圈回来，每个人都背回一大捆书报。当天晚上主席用红笔划出记号，我们便照着剪下保存起来。

一天，我们到了江西的信丰县。刚住下，主席便对我说：“陈昌奉，走！到邮局去！”

邮局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就是个贩卖书报的商店。

到了邮局，主席在一大堆书报里翻着，不时挑出几本书、几张报递给我。

付好钱以后，我一边整理着书报一边问主席：“主席，邮局都管些什么？”

“邮局管得可多啦！”主席对我解释说：“送报、送信、打电报、打电话都要它。你要是给家

里写信，它就会给你送去。”

“我给家里写信它也能送到？”从邮局出来，一路上就想这件事。这可太好了！算算我离家也有两三年了，家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？父亲还在吗？他怎么活着？……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一下子涌到脑子里翻腾起来，要是能给家里写个信该有多好呀！

回到宿营地，天已晚了。放下书报，给主席点上灯，他就开始翻阅起来。按时间我该给主席打饭去了，可由于“邮局问题”搞得我脑子里挺乱，光想着这件事，竟站在主席面前发呆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主席看我神色不对头便问道。

“主席，”我说：“我家的信，它也能送到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主席问。

“邮局！”

“能。你家也是苏区了！”主席知道了我的问题，接着说：“想给家写信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一面走上前去轻轻地说：“主席，我想给家里写封信，可是……”

“写不来！”没等我说完主席便接上说：

“来，我给你写。”

一听主席要给我写家信，可把我乐坏了！可又一想，主席这么忙，还要耽误他的时间，心里有点不安。我正为难，就听主席说：

“你想告诉你父亲些什么？”说着就推开报纸，拿出信纸来。

“我……”是呀！我对父亲说些什么呢？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了。我说：“主席，你看着写吧！反正谈我在红军里好，跟着您好，很好很好就是了！”主席又问过我家的详细地址和我父亲的名字，我就打饭去了。等我打饭回来，看见主席拿着笔在思考着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时让他吃饭是不合适的，便把饭盒子轻轻地放下走了出去。

我躺在松软的稻草铺上，觉得全身热得很，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着我自己，想着主席。我，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，参加了自己的队伍，当了共和国主席的警卫员；现在居然由主席亲自给我写家信，几年来，主席对我各方面——从生活到学习，一直象慈父般地关怀着我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恩师呵！就这样想呵，想呵，眼泪竟不由人地顺着两颊滴在稻草上。夜深了，我又跑出去，望见主席屋里的灯还亮着，他还在工作呢！

第二天上午，我端着饭走进主席的办公室，他拿着那早已写好的信，交给我说：“信写好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我连忙放下饭盒，双手接过信来，惶惑地说：“行！这还能不行！”

“快送邮局发走吧！”主席催促着我。

“您在吃饭哪！”

“不要紧，快去吧！”

我突然敬了个礼，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出了主席的办公室。

回来后，主席望着我说：“这可放心了吧！还想家吗？”

我傻笑了一会儿说：“不想了！”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部队攻打建昌县的时候，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到了广昌。广昌这地方离我的家乡宁都已经比较近了，回家看看的念头一下子冒出来了。到达广昌的第一天，我便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到广昌府我可熟了，要是回家看看，我可认得路呐！”

主席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一点嘛，越走离你们家越近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大声地说出这两个字，高兴得

心都要跳出来了。

两三天以后，我就跟着主席到达了我久别的家乡——宁都县。一住下，主席就把我叫去，拍着我的头说：“想回家不？”

“……想。”

“好！”主席说：“这几天我在这里开会，你回家看看。”主席说着停下来，望着我问道：“要多少天？”

主席一说让我回家，我脑门里轰地一下热了起来。他这一问，我一时无法回答。于是主席伸出了一双大手说：“十天，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好！”说罢就想走。但当我刚要挪动脚步时，陡然想到我回家之后主席的生活谁来照顾呢？“不，主席，我不回去了！”我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主席好奇地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我回家您吃饭、喝水怎么办？”

主席笑着走到我的面前，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慈爱地说：“去吧！回家看看，回来工作就更有劲。你们家也是苏区了嘛！”他停了停，又对我说：“回来不要到宁都来找我了，直接到长汀去，我在那里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一直很激动。家……